·科学技术史·

20世纪法国科学史建制化的历史学起源（1900–1958）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gin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1900-1958)

李云逸 /LI Yunyi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摘　要：尽管法国的科学史与法国的哲学发展具有难以割舍的关系，但是在20世纪法国科学史建制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历史学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在力图改变历史学研究范式的“新史学”运动中，法国历史学者亨利·贝尔提出了“综合”思想，尝试将各种知识的历史统一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诞生了著名的“年鉴学派”，科学史学者与贝尔也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贝尔成立的国际综合中心在促进科学史发展上十分活跃，同时也推动在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科学史研究所。而费弗尔、柯瓦雷与贝尔的分歧则导致了1950年代“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的建立。

关键词：亨利·贝尔　“综合”思想　法国科学史发展　年鉴学派

Abstract: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the role of history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is disciplin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new history movement, which sought to change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French historian Henri Berr proposed the “Synthèse” and attempted to unify the history of various kinds of knowledge. In this process, not only was the famous Annales School was born, but also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Henri Berr cooperated deeply. The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founded by Henri Berr was very active in promo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 also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e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Frenc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Lucien Febvre, Alexandre Koyré and Henri Berr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Centre Alexandre-Koyré-CAK in the 1950s.

Key Words: Henri Berr; Synthè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Annales School

中图分类号：N09; 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11.008

如今，当学者们提及法国的科学史研究时，最津津乐道的是哲学发展在其中的作用。一般认为法国科学史研究的哲学观念起源于19世纪末的奥古斯特·孔德。他尝试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一个“科学通史”的教席。而在1940年年末，当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接手科学哲学的教学工作，并指导巴黎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时，他也强调了法国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是应当继续保持的特点。但是，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的相关论著，以及在20世纪初法国科学史建制化过程中散落于各种期刊上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学在法国科学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新史学”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3日
作者简介：李云逸（1988–）男，上海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科学技术史、法国科学技术史、中法关系史。Email: liyunyi@ihns.ac.cn

运动。本文将通过国内能够获取的相关资料，试分析法国科学史建制化过程中历史学的相关影响。

一、亨利·贝尔基于历史学的“综合”思想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们试图扩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以结束对政治军事史的长期迷恋。这股“新史学”的思潮在法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pp.13–15）（[2]，p.22）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与知识网络的关键节点。

当时法国社会与学界的气氛伴随不断的科学新发现编织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变化”网络。在过去被人们认为是难以动摇的知识体系都在发生着改变，而非单个学科所面临的孤立问题。贝尔认为由知识体系变化而导致的各种“危机”不应是彼此毫无关联的存在，而是应当通过积极的、科学的和统一的方案得到共同的解决。这种方案便是“综合”。它以一种合作与自由开放的精神寻求汇集观点与建立桥梁，以避免19世纪末以来的学科分裂，从而“让各种科学的成果能够被使用并发挥效力。”[3]如何进行“综合”？在贝尔看来，历史学是一门优秀的“综合科学”，甚至是最重要的、可以接近真理的科学。因为在他眼中所有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和理解的工作，都是具有历史的。同时，历史学的解释力取决于历史的原因和规律的非常特殊的性质，而知识的内在的活力可以通过历史表现出来。因此，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综合”能够开辟一种知识的联合。所有的知识都能够处于相同的、科学的尊严水平上。于是，每一种知识便都能够保留自身认识论的特殊性，从而实现没有等级秩序的统一，为人类提供理想的、关于文明问题的解决建议。[3]

20世纪初，贝尔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践。1900年，他创立了期刊《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他力图包含和联合所有的历史，特别是所有的智力活动和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的演变，以显示出人类文明的多面性特征，从而能够把“综合”组织起来。[4]贝尔希望这本刊物能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平台来对人类文明各个层面的历史进行科学的考察与批判，并强调这种“新史学”需要与其他知识实现“综合”，而历史学学者也需要为知识的统一做出贡献。[5]贝尔的思想和办刊宗旨似乎与保罗·坦纳里（Paul Tannery）的科学史观不谋而合。后者通过业余时间研究科学史，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数学、天文学以及17世纪的科学。虽然坦纳里没有获得任何长期的学术职位，但被科学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乔治·萨顿尊为第一位科学史学家。坦纳里所处的年代，国际学界已经在数学史、力学史、医学史等学科史领域取得了进展，他却认为分散并依附于相关学科的史学研究无法实现科学史的自主性。[6]坦纳里希望能够实现综合的、更为广泛的科学史研究，并通过编纂科学通史，将科学史引入大学教育，实现科学史的“大综合”。[7]贝尔与坦纳里很快成为朋友，贝尔专门为坦纳里在《历史综合评论》上开设了科学史专栏，坦纳里撰写了介绍当时自然科学领域历史研究状况的文章。坦纳里计划从计算技术讲起，逐渐延伸到科学的其他分支，引起读者对科学史的兴趣，或者能够带来重要的结论，并为“综合”理论提供一些观点。坦纳里为贝尔的期刊带来了数学史、地理史、力学史与天文学史等内容。[4]在此期间，1903年，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最高点——被提名为法兰西公学院科学史教席的候选人。为此，坦纳里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科学通史的论述刊登于《历史综合评论》。在文中，他表示，科学的历史值得像艺术或文学史一样被研究和教学，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并且在将来也会越来越具有优势。坦纳里认为科学的历史依然没有获得与其他历史学研究对象相同的地位，所以有必要为之后的工作确定方向。不过，法兰西公学院没有给予他进一步施展的空间，而是选择了第二候选人格雷伊古瓦·维罗波夫（Gregoire Wyronbolf）。1904年，坦纳里去世，这篇准备作为坦纳里就职宣言的文章成为了他在《历史

综合评论》上刊载的最后一篇发表物。[6]，[8]

通过与坦纳里的合作，可以看出，贝尔对科学史的兴趣是被置于他宽泛的“综合”与历史学框架之下的。与坦纳里相似，贝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能够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于研究文明中的逻辑如何发展为思想，思想如何发展为科学。而讨论人类知识的进步史，就有必要突出科学史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人类思想史与文明史。[8]此后，贝尔对如何开展科学史研究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发现的起源，即创造性的工作、观察和直觉的作用及其关系，以及连接进步的逻辑。其次，科学史需要研究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这包括社会、环境和集体需求等等。另外，学者们也需要关注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与影响。[9]从1913年起，这位高师人便用《人类的演进》（*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为主题尝试编撰丛书来实施自己的史学理论。[10]

响应贝尔的学者中较为重要的有科学史学者阿贝尔·雷伊（Abel Rey）。雷伊在1896年获得了中学的哲学教师资格，在190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此后为第戎文学院（Faculté des Lettres de Dijon）供职，之后于1919进入巴黎大学任教，是法国高等教育协会（Société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的重要成员之一。[11]，[12]雷伊认为如果想要论述人的思想，那么思想史在历史学中是十分重要的。而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体现与演变，所以，科学史应当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雷伊的这些观点得到了贝尔的赞同与支持。[8]1930年代初，雷伊完成了两部讨论古代科学的著作。第一部探讨了希腊时代之前的东方科学，于1930年出版。在此基础上，第二部于1933年出版，主要探讨了公元前6–5世纪古希腊地区的科学起源以及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雷伊认为科学诞生于早期的技术，并在爱奥尼亚和希腊得到完善。雷伊指出，古希腊人实现了纯粹理性，并将它们所有获得的知识都进行了理性化。这为西方科学做好了准备。[13]，[14]这两本著作都是贝尔《人类的演进》系列的组成部分。

除了雷伊之外，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也受到贝尔思想的鼓舞，他们与贝尔是高师校友。在就读高师期间，两人觉得传统的历史学内容乏味枯燥。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激起了他们对历史学的兴趣。[5]布洛赫与费弗尔从此便长期为该期刊供稿，并参与到《人类的演进》系列的相关工作中。（[1]，pp.18–20）布洛赫在与贝尔的合作中发现需要加入“当代史”的内容。同时，他认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与经济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论题。[15]1928年，布洛赫倡议与费弗尔主办新的刊物。费弗尔希望这份刊物与《历史综合评论》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16]1929年1月15日，两人创刊了《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以下简称《年鉴》）以实践他们的学术主张。（[1]，pp.34–35；p.40）该学派在日后因这本期刊被称作“年鉴学派”，成为法国“新史学”的代名词。在科学史与技术史方面，费弗尔与布洛赫也受到贝尔的影响。《年鉴》于1935年11月出版了特刊：《对技术史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费弗尔撰文认为，法国历史学界长期未能重视科学史。他指出，思想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应当是科学史的核心组成，否则科学史就会变成一些轶事与抽象公式的组合。他认为，技术史和科学史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技术史是科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二、国际综合中心的建立和法国科学史的早期建制化与国际化

1903年，贝尔为了进一步推广“综合”思想，一方面制作并向法国主要大学与学术机构分发关于历史教学问题的调查表以考察历史学界对“综合”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准备参加法兰西公学院教席的竞争以获取更高层次平台的支持。但这两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到20世纪20年代，一种来自美国的思潮影响了法国，即让多数人参与到学术精英的活动中，并发展一种积极的传播科学的形式。这导致了法国“百

科全书”思想的复兴，同时，也推动了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学术组织走向国际化的知识合作，以重塑法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在这种背景之下，贝尔的“综合”思想才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1925年11月，国际综合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以公共事业基金会的定位被批准成立，享受政府补助。[18]

国际综合中心的成立在20世纪初法国科学史建制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928年，意大利著名科学史学者阿尔多·梅利（Aldo Mieli）会同雷伊、萨顿和英国科学史与技术史学者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在8月14日至18日在于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国际科学史研究组织的倡议。[19]该倡议得到了贝尔的支持，他明确指出“科学史[.....]的培养太少，而且只是以一种不连续的、乏味的方式或以一种纯粹的技术方式进行。然而，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密切相关[.....]对于作为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和行动的综合[.....]没有什么比科学史更重要了。”[8]1929年，国际综合中心全程参与了国际科学史委员会的成立工作。1929年5月20日至5月25日在国际综合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与国际科学史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8]在会议期间，国际综合中心于5月22日正式宣告落成于内韦尔公馆（Hôtel de Nevers）。这里曾经是法国的王家图书馆。所有的正式成员与通讯成员以及参与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科学史研究者也被邀请参与了中心组织的第一届“综合周”活动（Semaine de synthèse），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文明与演化的主题进行讨论。[20]由国际科学史委员会改组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Sciences）也入驻了内韦尔公馆。[21]法国科学史学家勒内·达东（René Taton）曾表示国际综合中心所在的内韦尔公馆对于法国科学史学科来说是如同母亲般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这里也成为了国际科学史研究建制化的起点。此后，贝尔将他的中心进行了再划分。最初的两个部门，其一是由贝尔和费弗尔负责的历史综合部。另一个是由雷伊负责的自然科学部。[18]，[20]科学史曾计划归入后者，但为了让它得到应有的重视，科学史作为独立部门成为了中心的第四大组成部分，并由梅利担任负责人。[8]

除了举办国际性会议，贝尔的国际综合中心在人员组成上也的确成为了一个国际机构。其董事会的36名初创成员中，有16名外国人。在历史综合部，外国成员达23名。[20]科学史部人员相对较少，但也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态势。法国科学史学者有10人，包括科学史部秘书、化学史学者海伦·梅茨格（Helene Metzger）女士；研究牛顿相关问题的皮埃尔·布吕内（Pierre Brunet）；医学与生物化学家加布里埃尔·贝特朗（Gabriel Bertrand）；法国医学史学会主席皮埃尔·梅内特里耶（Pierre Menetrier）；法国医学史学会副主席马克西姆·莱涅尔–拉瓦斯廷（Maxime Laignel-Lavastine）；法国医学史学会秘书长马塞尔·福斯耶（Marcel Fosseyeux）；医学史学者吕西安·哈恩（Lucien Hahn）；医学史学者欧内斯特·维克斯海默（Ernest Wickersheimer）；以及科学史学者雷蒙德·博平（Raymond Beaupin）与弗朗西斯克·马洛特（Francisque Marotte）。国外学者有10人，包括科学史部负责人梅利；来自美国的萨顿；来自英国的辛格；来自比利时的欧洲古代史学者约瑟夫·比德兹（Joseph Bidez）；来自美国的数学史学者弗洛里安·卡乔利（Florian Cajori）；来自意大利的数学史学者吉诺·洛里亚（Gino Loria），来自德国的阿拉伯科学史学者朱利叶斯·罗斯卡（Julius Ruska）；来自德国的医学史学者卡尔·苏德霍夫（Karl Sudhoff）；来自瑞士的医学史学者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以及学者基多·韦特（Quito Vetter）。[22]

围绕国际综合中心，法国的科学史建制化达到了一个高潮。科学史部在梅利的组织下，一方面积极向法国社会传播科学史，努力开展科学史资料的汇编工作。他们的先期目标是制作1000份科学史文献的索引卡片。它们被按照

主题和作者姓名的顺序分组，并尝试增加了解释性或批评性说明，以方便研究人员的工作。[8]一个科学史图书馆也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并在之后成为拥有了近2000余册相关文献和对科学史期刊系统收集的场所，被誉为国际综合中心最应引以为豪的资产。[23]另一方面则是开展学术活动。科学史部在成立后第一年召开了五次学术会议，分别围绕17世纪牛顿理论对法国的影响、苏格拉底的科学思想、科学的起源和毕达哥拉斯派、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概念等问题进行探讨。[8]此外，科学史部也希望能够在法国高等与中等教育里建立专门的科学史教学。1931年5月13日，国际综合中心成立了法国科学史学家小组（Groupe Français d'Historiens des Sciences），由雷伊与梅茨格共同领导。小组成员们认为科学史教学在法国非常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组织并给予科学史更大的重视。小组决定向法国政府提交建议："（1）在一些大学设立科学史研究所；（2）科学史成为中学教师培训的一部分"。[24]事实上，雷伊在1930年正式成为了巴黎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教授，增加了自身的影响力。[12]由此，在1931年11月30日，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大会举行时，在雷伊的提议下，大会一致决定建立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1932年1月28日，科学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正式成立。雷伊出任负责人。1932年3月4日，研究所举行了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强调需要建立具有适当方法的科学史研究，并希望研究所不仅隶属于巴黎大学文学院，还需和其他院系展开合作。雷伊则希望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讨会能让学生和历史或哲学专业的学者一起工作。但在各院系的合作力度上，雷伊只获得了国际综合中心科学史部成员的支持。莱涅尔–拉瓦斯廷作为巴黎大学医学部的代表参与了研究所的管理。在董事会中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则是费弗尔。而正如上文所述，在研究古希腊科学史，并帮助贝尔编纂系列图书的过程中，雷伊认为科学史是以技术史为基础的，因为技术史和技术原理是科学史和哲学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1933年，他便将科学史研究所改名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研究所开设了涉及科技史、历史学等方面的研讨会，由不同专业的学者主持，既有国际综合中心的人，也有逃离纳粹主义的德国学者。这成为研究所的主要的学术活动。1937年，研究所颁布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证书的详细计划》（Programme Détaillé du Certificat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 Sciences）。其中有两个选项：选项A是"科学通史"，涉及科学与人类思想史的关系，特别是与逻辑思想及其方法的关系。选项B是"当代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历史"，涉及它们的历史渊源和它们的哲学互释，以及它们与哲学史、逻辑学和一般文明史的关系。虽然，总体上进入研究所学习的人还是较少，根据雷伊的统计，在1936年只有11名法国学生、4名外国人、6名免费旁听生和50名以各种身份参加研究所的工人。[25]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建立仍然是法国科学史建制化的重要一步。

三、费弗尔、柯瓦雷与国际综合中心的分歧以及柯瓦雷中心的成立

在与贝尔共事期间，作为国际综合中心重要成员的费弗尔与贝尔产生了分歧。虽然贝尔实践"综合"思想的每一项行动费弗尔都投入其中，并承担核心工作，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在1930年代迅速发展。费弗尔辞去了在国际综合中心以及相关期刊的所有职务。这种冲突一方面来自费弗尔对法国"新史学"运动的反思。在他看来，到1938年，"综合"思想以及其他史学理论的尝试依然较难撼动法国传统史学的地位。"综合"思想与教育体系中的历史学依然呈现出对立的态势。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局面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历史学在法国仍未能体现出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和获得一种确定性。这种"半失败"让费弗尔陷入了焦虑。另一方面则是贝尔对中心和期刊的管理让费弗尔感到不满。费弗尔认为中心的管理层必须能够更好地控制相关期刊的发行与预算。他的工

作也需要中心主任给予与自己任务相配套的高效团队。但是，费弗尔却发现他无法与雷伊等人形成协作，譬如在期刊编辑中有关思想史的内容被后者独占了。费弗尔失望的表示贝尔变得越来越狭隘与不可理喻。而贝尔与费弗尔在法国《百科全书》项目上的竞争成为压垮两者关系的最后稻草。[16]在法国“新史学”运动前期如同父子般的两人决裂了。

1935年1月，亚历山大·柯瓦雷被接纳为国际综合中心科学史部的成员。（[26]，p.35）在同月举行的学术活动上，他提出了对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个人观点。柯瓦雷指出，研究者需要重视哲学与宗教的作用，因为哲学和宗教概念就像语法规则一样，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会记住这些规则，而当它们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它们又会消失。其次，他认为，不是知识的条件决定了这门科学的对象的现象存在条件，相反，是存在的客观结构决定了人类知识能力的作用和价值。由此，柯瓦雷表示16世纪科学知识的变化不是一种连续性导致的结果，其条件是由否定构成的。这些观点将在他之后的研究中得以完善，并呈现出有关科学发展的不连续的、现代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了他与贝尔、雷伊和梅茨格的分歧。尽管在表面上，贝尔表示柯瓦雷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并能揭示科学史有助于推动人类思想史的探讨。但事实上，后三者认为首先，科学的进步呈现出的是一种连续性。其次，作为认识主体的创造，是人类精神上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社会创造。最后，进步具有不可逆转性。[24]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似乎可以解释为何柯瓦雷被排斥在了国际综合中心的科学史圈子之外。尽管柯瓦雷也成为了巴黎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成员，但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研究所里做过一堂演讲。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研究所的“科学史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的名单上。而根据达东的记述，直到1950年3月，柯瓦雷才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院士。（[26]，p.117）

最终，柯瓦雷走向了“年鉴学派”。一方面，费弗尔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强调一种集体态度或“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27]（[1]，p.30）柯瓦雷的思想史研究与之接近。同时，他也进行心态研究。另一方面，柯瓦雷与费弗尔持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科学史和技术史紧密相连。（[26]，p.118）柯瓦雷事实上将费弗尔的“新史学”作为了自身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费弗尔则称赞柯瓦雷是法国最好的伽利略科学思想研究者。他指出，柯瓦雷对伽利略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他还高度赞扬柯瓦雷的“从模糊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Du Monde de l’à peu près à l’Univers de la Précision）一文。[28]费弗尔的态度与雷伊对柯瓦雷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雷伊曾表示柯瓦雷对伽利略的所有推理和阐释都是猜想，没有任何分量。[24]

二战之后，在费弗尔的协助下，1951年，柯瓦雷以创立一个科学思想史教席的名义应聘法兰西公学院。[29]在失败之后，1954年，费弗尔在自己的学术机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第六部为柯瓦雷专门设立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柯瓦雷任研究主任（directeur d’études）。（[26]，p.119）1956年，在费弗尔去世后，他在学术上的“儿子”——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接管了第六部，开启了“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时代”。布罗代尔在法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控制力极强，这包括了出版机会和研究资助，甚至还有工作岗位，以此来推动他的学科建设理想。（[1]，p.71）在这样的背景下，柯瓦雷抓住了这个机会。1957年5月，他写信给布罗代尔，希望能在第六部内设立一个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心。同年7月12日，他提交了建立该机构的草案。（[26]，pp.135–137）柯瓦雷希望新成立的中心在内韦尔公馆办公与教学。其主要原因应该是考虑到这里驻有法国和国际上主要的科学史组织。柯瓦雷的请求得到了布罗代尔的支持。[29]1958年7月17日，由布罗代尔签文，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6]，p.137）一个法国科学史研究发展上的新篇章由此开启。达东为了纪念柯瓦雷的贡献，在柯瓦雷去世之后，将第六部科

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命名为“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

结　语

法国科学史在20世纪能够实现建制化无疑受到了历史学领域“新史学”运动的深刻影响。贝尔基于历史学的革新而提出的“综合”思想及其学术机构的建设不仅推动了“新史学”运动的发展，导致了“年鉴学派”的诞生，也极大推动了法国科学史建制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事实上，贝尔的“综合”思想提供了极其宽泛的架构，其中的知识体系统一，但不分等级，由此构建出一个松散的、包罗万象的、非常自由的思想碰撞空间，任何知识的历史都能被纳入其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包容，导致其发展陷入了一种困境。贝尔仅仅只是以历史学为基础搭建了各种知识相互交流的平台，却未能有进一步的方法论演进，这可能是费弗尔在二战之前对法国历史学发展感到悲观的原因所在。费弗尔则在受到贝尔引领，加入“新史学”运动之后，努力向邻近的人文学科以及更广泛地从自然科学中借用研究方法和组织形式，并在其后辈的努力下，使得“年鉴学派”终于引发了被称为“史学革命”的方法论转变。在第六部建制之下的“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也将在其后的岁月中为法国的科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 彼得·伯克.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2014[M]. 刘永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 张正明. 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3] Gattinara, E. C. 'L'idée de la Synthèse: Henri Berr et les Crises du Savoir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Xe Siècle'[A], Biard, A., Bourel, D., Brain, E. (Eds.) *Henri Berr et la Culture du XXe Siècle*[C],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21–38.

[4] Berr, H. 'Paul Tannery et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1954, 7(4): 297–302.

[5] Siegel, M. 'Henri Berr'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J]. *History and Theory*, 1970, 9(3): 322–334.

[6] 郭明哲. 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05–107.

[7] Taton, R. 'Paul Tannery (1843-1904)'[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1954, 7(4): 303–312.

[8] Blay, M. 'Henri Berr et l'Histoire des Sciences'[A], Biard, A., Bourel, D., Brain, E., et al. (Eds.) *Culture du XXe Siècle*[C],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121–137.

[9] Berr, H. 'Antécédents de la Nouvelle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1947, 1(1): 5–8.

[10] Lucien, F. 'Henri Berr-un Deuil des “Annales”'[J].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5, (1): 1–2.

[11] Toutain, J. 'Abel Rey (1873-1940)'[J].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1940, 94: 120–121.

[12] 'Rey (François, Abel)'[A], Christophe, C. (Ed.) *Les Professeur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Paris-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1909-1939*[C],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 1986, 184–185.

[13] Richard, G. 'Abel Rey, La Jeunesse de la Science Grecque, 1934'[J].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1935, 37(2): 231–232.

[14] Diès, A. 'La Jeunesse de la Science Grecque'[J].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1933, (40): 52–56.

[15] Nicolas, R. 'Bloch Marc, Écrire la Société Féodale. Lettres à Henri Berr, 1924-1943'[J].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1994, (41): 127–128.

[16] Müller, B. 'Lucien Febvre et Henri Berr: De la Synthèse à l'Histoire-Problème'[A], Biard, A., Bourel, D., Brain, E. (Eds.) *Henri Berr et la Culture du XXe Siècle*[C],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39–59.

[17] Febvre, L.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J].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5, (36): 646–648.

[18] Gemelli, G. 'Communauté Intellectuelle et Stratégies Institutionnelles-Henri Berr et la Fondation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J]. *Revue de Synthèse*, 1987, (108): 225–259.

[19] Herlea, A. 'Petre (Pierre) Sergescu (1893-1954): Historien des Sciences et Promoteur de la Discipline'[A], Barjot, D. (Ed.) *Transmission et Circulation des Savoirs Scientifiques et Techniques*[C], Paris: Édition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2020, 193–210.

[20]Febvre, L. 'Le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J].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5): 81–83.

[21]Chalus, P. 'Henri Berr (1863-1954)'[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1955, 8(1): 73–77.

[22]Lefebvre, T. 'Eugène-Humbert Guitard et l'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1932-1939)'[J]. *Revue d'Histoire de la Pharmacie*, 2014, (384): 463–478.

[23]Fauque, D. 'René Taton (1915-2004)'[J].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2005, 58(2): 267–304.

[24]Redondi, P. 'Henri Berr, Helene Metzger et Alexandre Koyré: La Religion d'Henri Berr'[A], Biard, A., Bourel, D., Brain, E. (Eds.) *Henri Berr et la Culture du XXe Siècle*[C],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139–155.

[25]Braunstein, J. F. 'Abel Rey et les Débuts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1932-1940)'[A], Bitbol, M., Gayon, J. (Eds.) *L'Epistémologie Française, 1830-1970*[C], Paris: Éditions Matériologiques, 2015, 163–180.

[26]Koyré, A. *De la Mystique à la Science. Cours, Conférences et Documents, 1922-1962*[M]. Edités par Redondi, P., Paris: Éditions EHESS, 1986.

[27]周兵. 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8,(1): 56–67.

[28]Febvre, L. *Au Cœur Religieux du XVIe Siècle* (*Deuxième édition*) [M]. Paris : S.E.V.P.E.N., 1968, 292–296.

[29]Taton, R. 'Alexandre Koyré et l'Essor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n France (1933 à 1964)'[J]. *History and Technology*, 1987, 4(1–4): 37–53.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